

在 开 放 中 前 进

宋承荣 张青山

(马列教研室)

一、历史的启示: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凡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强大的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面,都留有自己的光辉记录,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

在西汉,经过“文景之治”以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国家。汉武帝时,曾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克服了艰难险阻,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和条支;第二次出使,张骞率领300人的使团,访问了乌孙和安息(伊朗)。由于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很多国家派遣使臣和商人携带礼物随汉使到中国观光,使得丝绸之路增辟为两北两道。丝绸之路对沟通当时的国际贸易,发挥着突出作用。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即称中国为“塞勒斯”,意即“丝国”。西汉时,大量中国丝绸运往西方,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在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议员乃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着中国丝绸为荣,甚至基都教会的法衣、祭服、祭坛装饰都用中国丝绸。

丝绸之路的开辟,各国商品畅通,不仅增强了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文化经济交流,也增强了西汉的经济势力,中国丝绸在罗马的售价比在印度的售价贵100倍,其丝价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因此,中亚国家都拼命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塞琉古王朝掌握控制权,结果,这笔垄断收益在它的经济上财政上均占首位。可见,丝绸之路在当时各国经济活动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际贸易商品,中国的丝绸曾经打开了各国的城门,是中国的丝带把欧亚两洲联结起来的。

在唐朝,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力除隋末弊政,推行了一条革新路线,所以出现“贞观之治”,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实行着开放政策,对欧、亚、非众多国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在亚洲,唐朝大量接受朝鲜、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哲学、历史、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日本先后13次派遣唐使,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日本建筑、文字、服装,乃至日常生活,都深受中国影响,至今唐风犹存。特别是在公元646年,日本仿照唐制,改革了行政制度,实行了“班田制”、“租庸调”制,这就是著名的日本“大化改新”,使日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在西亚和非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的国都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城市和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学生,艺术家和教育家。由于实

行鼓励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政策，所以在长安、扬州等大城市，经常居住着数以千计的波斯商人。现今在中国陆续发现的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就是唐朝与西亚、欧洲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为了尊重各国商人的宗教习惯，唐朝还为他们建立许多清真寺。在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丝织工艺技术通过阿拉伯先后传到非洲和欧洲，其中，造纸术传入西欧，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明朝，朱元璋开国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措施，经济恢复发展很快，因此，明朝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的富强国家。同汉、唐一样，明成祖很重视发展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实行开放政策。他于1405年到1433年的29年间，七派郑和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至一地都进行友好访问，进行平等的经济贸易，很多国家派遣使官，携带礼品随船来中国回访。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印度和哥伦布发现美洲都早半个多世纪，其规模更是比后者大的多。问题是，中国人由海路向西方探索后，为什么西方人也由海路向东方探索？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应该从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物质动因中求得解释。当时中国经济势力强大，商品经济已相当发展，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指南针早已运用于航海，因此，经济发展要求对外开放，在平等的经济贸易中，以通有无，进一步增强国力。西方开辟新航路的物质动因，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说的很清楚：“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可见，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因原始积累而掀起的寻金热，是他们的物质动因。中国人向西探索，西方人向东开辟，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恩格斯指出：“无论什么时候，经济的发展总是无情地，无例外地打通自己的道路。”所以，在表面看来是偶然的的东西，在其背后总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两大半球的对向探索，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外在表现。

由西汉、唐、明三个强盛时期看，都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反过来，开放又促进了自身的进步，所以，直到明朝，中国仍然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当然，与今日的开放相比较，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开放，各具不同的历史内容，不同的阶级要求，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客观条件，但它在博采天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吸收、消化中壮大自己的功效是一样的。可以说，凡是强盛的时期必然是实行开放的时期，而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又必然是强化了自己、对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时期。也许，这是历史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方面。

但是，光有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这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清朝闭关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恶果。对此，理应给以历史的考察：自哥伦布等开辟新航路以后，西方海盗和商人逐渐接触中国，1517年葡萄牙8艘武装商船进入广东屯门港，1557年以讹诈手段霸占了澳门，1575年西班牙商船首航中国，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后被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接着英、法、美商船也相继来到中国。所有这些武装商船进入中国海岸，都鸣枪放炮，沿海抢掠，拐骗人口。直到18世纪后才侧重于海上贸易。贸易中，清政府只准外商在广州与13家公行交易，并有各种规定，如：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借外商资本；不给外商服役；外国兵舰不得入港；不准私运武器；不准外商坐轿等。这就是英国人称为闭关

政策的基本内容，并千方百计要打破它。先是派洪任辉来中国，要求开放广州而外的三口，被清拒绝；1793年马甘尼来中国，要求开港口，割一岛，又被拒绝；1816年又派阿美士德交涉，重提上述要求，嘉庆没有答应。1836年，英国再派商务监督义律来华交涉。应当指出，在这些交涉的同时，总是伴随着英国兵舰的武力威胁和挑衅，并且，英国商人早已把鸦片作为打开闭关自守大门的武器，英国终于挑起了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签定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百年之中，中国被分割，被奴役，被剥夺，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和斗争，才使中国免遭沦为殖民地的更可怕的厄运。

按照同一历史座标，观察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在鸦片战争的当时，处于什么状况？有必要在比较中去认识真理。日本在经济上：自大化改新以来，经过1000年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基础；在政治上：由天皇、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残酷剥削着广大农民，广大农民被压在这金字塔的最低层，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在文化上：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从中国移植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日本的精神支柱，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在国策上：自1639年以后，日本幕府实行的是锁国政策，规定：除中国、荷兰外，禁绝与其他国家通商，仅在长崎设一特定通商口岸，担任翻译的“通事”，说荷兰语是可以的，但不准阅读西方任何书籍。

由此可知，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日本相比较，从形式到本质，两国是极为相似的。所以，当英国用武力打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以后，同样的历史命运早晚要降临日本。果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舰队进入东京湾，武力强迫日本开放海禁。第二年，幕府被迫与美签定《日美亲和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港，打开了日本锁国之锁。至1858年荷、俄、英、法又先后叩关，强迫日本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第一冲击波的承受者是中国，当第二冲击波来到日本时，历史已过去了十多年。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说得对：“由于日本受培里来航的直接压力比中国晚了十多年，统治阶级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不很充分，却能够有了对付它的余裕。”就是说，日本可以在中国这一防壁后面，拥有做出对策的时间。中国的失败，引起日本的极大震惊，形势的变化，使统治者只能放弃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兰学家”们的迫害，重新重视高野长英，高岛英帆等人的主张。同时，“攘夷论”和“尊王论”也逐渐兴起，它作为对外激励士气富国强兵的手段，对内又成为打倒幕府的战略，使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最终得势，打倒了德川幕府，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明治维新。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与中国只是一步之差，但这一步却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进中的日本，国际观上有一个根本的变化，由从文化道德的优劣来区分华夷内外的国际观，转到崇奉实力征服的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上来。也就是从消极的锁国转到积极的战略开国。明治维新的目标是为了“与万国对峙”，所以，这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终于使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从锁国一旦变为开国状态，就带有极大的侵略性。“征韩论”的出现，侵台计划的实施，就是历史的证明。

过样，战后的中国不仅受着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而且面临东方日本的军事压迫，

中国被夹在中间，背腹受敌。万里边疆，处处烽火，瓜分豆剖，岌岌可危。近代中国和日本，由基本相同到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令人深思。鸦片战争作为历史事件，具有着复杂的多侧面，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腐败，经济发展比西方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但原因之前有原因，结果之后有结果，如果从这因果链条中去进一步观察，就会看出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国策，就成为不能小视的因中之因了。有了这个因，对内必然压抑早已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外必然对任何先进的东西概斥之为“奇技淫巧”，拒绝吸收。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的失败，而这个结果的系列，则构成中国百年来灾难深重的历史。历史不过一纵一横，如果把中国近代史放到世界史中去认识，对正确理解党的开放政策，会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的。

二、列宁的实践

这里所谈的是，列宁在苏维埃建政初期实践活动的一个侧面。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总是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部分开始，并首先获得成功。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却立即面临着14个国家的军事压迫，国内又有高尔察克等叛乱，无非是要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中，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面对着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险恶局面，列宁提出通过租让制，合营公司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等方式，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资金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1921年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或许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租出巴库的四分之一，格罗兹内的四分之一，以及我们最好的森林资源的四分之一，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多少可以赶上其他国家的现代的先进的辛迪加”

（列全，32卷，171页）其后，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完全公开的承认，我们并不掩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就是向资本主义缴纳贡税，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根据列宁的战略思想，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同英、美、日等国都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据统计，1926年以前，苏联先后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伙组织公司24个，签定租让合同135个，从美国，西欧引进很多先进技术和设备。聘请了大批美国专家，派出大批人员到美国学习。苏联的拖拉机厂、汽车制造厂，大部从美国引进成套设备，又从瑞典、英、法、日等国贷款20亿卢布，克服了经济困难，加速了工业建设。列宁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实践证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不仅没有通向资本主义，而是有效的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基础，迅速地发展了生产力，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无疑，这个成功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同样存在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局面，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外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对内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告完成，这一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主要的是从苏联引进先

进技术和设备，建设了 156 项工程，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也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这些，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有着重大意义。可惜的是，这一方针没能很好地坚持下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把向外国先进东西学习诬之为“洋奴哲学”，把抓经济建设扣上“唯生产力论”，总之，他们除了祸国殃民外，根本不顾除了“自力更生为主”而外，还有“争取外援为辅”，别说利用外资，就连科学技术也都给带上了阶级性，还谈什么对外开放呢？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直接违背列宁的教导，列宁指出：“已经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所必须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全，27,386页）可见，通过积极的对外开放，实行拿来主义，扩大强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文化基础，从而把人类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列宁在建政初期的战略出发点。应当说，列宁的创造性实践和理论，不仅给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更为我们今天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三、现实的要求

正当四人帮关起门来大搞内乱的十年之中，世界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度工业化之后，开始从工业社会转入所谓的信息社会，其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宇航技术等被广泛利用，生产力得到飞跃的发展。从6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达10年多的繁荣时期，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它的机会，经济起飞了，南朝鲜、新加坡等靠外资搞加工也发展起来了，而我国却陷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又是一步之差，拉大了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现今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对我国更是严峻的挑战，有人断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140 年中最深刻的挑战，不亚于一个世纪前商品经济对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生产方式的冲击。据统计，到本世纪末最发达国家与最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是 746 年。本来，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源出口的优势，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朝着寻找节省能源，节省原材料，发明代替材料的方向发展，这样，资源出口的优势，很可能丧失。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廉价劳务出口，可是，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所谓铁领工人的出现，劳动力的优势又将丧失，因为在单位时间里，机器人的维修费用是支付工人工资的一半。所以，新的技术革命对每一个国家的考验都是严峻的。人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从不停顿的，它从来不会向任何民族提供额外的补课机会。所以就连最发达的国家都在制定自己的对策，美、日各以对方为目标，战略核心是保持尖端技术的世界垄断地位；在苏联，苏共中央号召：各部门要像十月革命时提出扫盲号召一样，克服对最新技术的无知；在法国，1982年曾召开四千人大会研究对策，认为：如不进行深刻的产业革命，“法国将面临生存问题”；在英国，认为“如果不注意信息革命，那就会像当年工业革命时，英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差距一样”，在我国，赵总理亲自领导了对策研究，并要求将研究的对策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充分体现出来。对此，中共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高瞻远瞩的指出：“还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

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迂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怎样吸收当代的最新科技成就？只有对外开放，别无他途。按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离开了这种具体联系，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会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事物也只有在其内部各种力量以及与它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才不断地由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也是开放政策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所以，闭关自守是人为地违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因此，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实现四化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还有能源、技术方面的困难，可是，现在世界上有8000亿资金在流动，找出路，我们是应该争取利用的。几年来，我们利用外资，装备多项新工艺，已兴办或正在兴办的企业也有较好的收益，比如：上海石化总厂、四川维尼龙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南京烷烯苯厂，这五个厂的技术装备都是引进的，每年总产值50亿元，提供利润30亿元，只要两年，就可收回投资。北京石化总厂，引进设备投资5亿，投产一年为国家积累资金5亿7千万元。这些设备如果完全自己研究制造，要花很长时间，代价会更高。所说新技术革命对我们是个机迂，就是我们在一些领域里，采用比较先进的科技成果，可能跳过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和光导纤维为标志的新时代。从几年的实践看，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结论只能是：对外开放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实现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这一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我们同时认为：对外开放与产生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随着对外开放，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而入。因此，应当在引进、吸收先进东西的同时，扬弃必须扬弃的东西，对此要有长远的战略措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很多人随着新的科技进步，反而感到人的精神越扭曲，很苦恼，看不见出路。所以，对他们坏的东西要抵制，在开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在这两个轮子的基础上，才能稳步的达到我们的目标，缺一不可，这是十二大已经确定的。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了透彻的理论阐述。四项基本原则已载入我国的宪法，它既反映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因此，应在开放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教育，激励崇高的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觉辨别和抵制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蚀的能力。这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避免大的失误之关键所在。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曾经长期的航行在前列，（下转 114 页）

THE CALCULATION OF RELEASED WARPLENGTH IN BOTTOM TRAWLING

Wang Ergu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formulas for length of warp towed by single and pair trawlers are derived respectively from cable dynamics equilibrium equations with the ideal working state of trawls as boundary conditions. By the help of computer, the released warp lengths for some commonly used sizes are precisely calculated under different water depth, net resistance and towing speed, and a table of released warp lengths is establish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fishing operation. The data in this table correspond quite well with the ones in military Burter, s table.

<>

<>

<>

(上接 132 页)

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又领导全国人民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我们也必将在党中央领导下, 在改革中发展, 在开放中前进, 去开拓更加光辉的未来。

MARCH ALONG THE OPEN POLICY

Song Chengrong

Zhang Qingshan